

我出身於一個大家族，祖母主管家裡事務，我有幾個叔叔和一個姨媽。我爸爸在十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大，長子的地位令他肩負沉重的責任。父輩和我的生活都圍繞一座位於軒尼詩道377號的唐樓，從1930年代落成到1970年代清拆重建，屹立了將近半個世紀。這是一個充滿生與死、戰爭與和平、快樂和憂傷的年代。

這座建於二戰前灣仔區的典型唐樓，樓上三層是住宅，地下是商舖。我們住在二樓，有一個寬敞的陽台，可以俯瞰軒尼詩道及鋪設在路中央的電車軌道；也可以遙望天樂里，看到電車經過跑馬地、左轉並朝中環方向行駛，菜市場則位於向東一街口的堅拿道西（參見下頁地圖）。我們的居所位置相當不錯，日常生活大部份所需都能在步行距離內解決。在菜市場對面的大街，有一個公共廁所，今天依舊存在。因家裡

的廁所是舊式馬桶，家中的男性成員每天都得使用公廁設施。隨著時代的變遷，從燒柴薪、木炭到使用煤油及液化氣體，都曾經是我們燒飯的燃料。

按照當時的標準，我們所住的唐樓稱得上體面。陽台的空間特別寬敞，可供作多種用途，如日常起居、遊玩、用膳及睡覺，更有幾張摺疊床可供晚上使用。主樓的樓面空間十分寬闊，可以分隔成四間睡房及一條走廊，走廊上亦可增加床位及作其他用途。從陽台到公寓的另一端，有一個兼連廁所的浴室和一個大廚房。為了擴闊居住空間，後來在廁所之上興建了閣樓。從最北端的睡房俯瞰，可以看到樓下商店的開放式庭院，亦可看到位於駱克道及馬師道西北角的國民戲院（National Theatre）。在戰前，我家的規模仍小，公寓有足夠的空間應付日常所需。事實上，陽台旁有一部份地方，租給了一位名叫馬達五的穆斯林中醫師，在二戰爆發前，他在這裡診病。寓所的另外一間睡房則租給一戶毛姓家庭，他們在戰後仍租用該房間。戰後，我們的家庭隨著嬰兒潮增添了新成員，公寓變得越來越擠迫了。到最後，變成了30多人住在一起，這很考驗各人的耐性和社交技巧，特別在使用浴室和廁所的高峰時間，彼此需要互相諒解和互相禮讓。

站在公寓的陽台，仍能勾起數段反映香港年月變遷和命運不斷轉變的回憶。日本人佔領香港對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諸如轟炸、壓迫和飢餓。盟軍整晚在海旁進行轟炸，意圖炸毀海軍船塢，但其中一顆炸彈卻落在我們居所附近的幾棟樓房，擊中平民，造成傷亡。對我們，特別是孩童來說，轟炸造成



相對於這個陰暗的情景，在農曆新年初二和初三，大部份具規模和主要的商店都會點燃鞭炮，可達到20至30呎高。這是期盼新一年生意興隆，也是一個嘈雜和哄然的開始。大部份大型商店都遵照這個習俗，我們的對面至少有兩至三間。後來由於火災及其禍害，官方禁止再放鞭炮。我的姐姐死於腦膜炎，也是源於一次在節日期間探親時被鞭炮聲嚇倒。

風俗及技術的轉變亦做成一些習俗的消逝，它們曾經為居民提供生活的便利和樂趣。每天清晨，如果一樓及二樓的住戶有訂閱報紙，就會有人把那些已被捲起及綁起來的報紙，拋擲至他們居所的陽台。在早期，這些陽台並沒有窗戶，所以容許這種派報方式，節省人們上落樓所需的時間。此外，每星期最少有兩至三個傍晚，在晚飯前，會有小販吹奏長笛吸引人們的注意，推銷各式各類的小食，以隔空的方式買賣，「飛機攪」（經包裝的橄欖乾）就是其中一種。當顧客投下零錢後，小販就會拋擲商品到顧客的樓層。較低的樓層一般不會太難拋，但頂層就有可能需要拋擲數次才成功。觀看這種戲劇性的交易是很有趣的。當街道上的交通越來越繁忙，同時人們傾向定期交易後，這些傍晚的「表演」便自自然然地消失。科技的變遷使人們不再採用這種非正統的購買方式。

陽台還有其他用途。1950年代，我的六叔嘉言和七叔嘉霖分別成家立室，婚宴都在家中舉行，兩次都邀請了超過120位親友。陽台擺放了兩張賓客桌，另外兩張則放在大廳，同時提供豐盛的菜餚。從外面僱了人手在廚房臨時幫忙，為烹調和奉客忙個不停。由於場地無法同時招待所有賓客，不少

人要坐在另一個廳堂。當時在浴室對面架設了一個棚架，以便築起一道橋。另外的人則坐在位於馬師道對面一間最好的穆斯林餐廳，距離我們家只是一步之遙。鄰里關係在這個場合是最為和睦的。每一個人——包括小朋友在內——都享受到食物和樂趣。但不幸的是，我家發生了一場意外，我的弟弟汝權因為好勝心，在玩跳樓梯遊戲的時候向朋友挑戰：「我能夠跳得高過你們當中的任何一個！」在晚飯後便從高處跳下來，當時無大人看管。唉！但這一跳就結束了有前途的年輕生命。汝權就讀幼稚園，比我小兩歲。因為一位中環知名兒科醫生的誤診，他很快就死於闌尾炎（即盲腸炎）。雖然當時我還很小，但這宗悲劇對我影響很深。此後，我跟哥哥汝谷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。到了今日，我依稀仍記得汝權就在離我家20分鐘路程的穆斯林墳場舉行葬禮。

汝權的離去，為我家帶來震驚和哀痛，因為這本來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。它揭露了那時候醫療服務的輕率。汝權感到肚痛近一星期，但醫生並沒有視闌尾炎為一回事。事後想來，也許他不能或不想進行手術。多年後，當我升上中學，其中一位摯友邵次強坦誠地跟我說，他也遇到跟我類似的遭遇，而失去了年幼的弟弟。他的家人同樣向同一個兒科醫生求診！雖然這位醫生在業界內有很高的聲譽，但他應診時卻會用電話進行股票或其他投資。數年後，社會多了不少投訴渠道，不再容許這等不專業的表現。

我的家，經歷了從搖籃到墳墓的過程，彰顯出生命的完全。我們大部份都是由我家幾個門牌外的穩婆（即傳統助產士）

接生的。當我最年少的弟弟汝榮在戰後出生時，我曾到過那個接生的地方。汝榮是我媽媽做輸卵管結紮手術前的第八個、亦是最後一個嬰孩。我想起我在戰時逝世的妹妹，感悟到死亡總可以突然降臨。妹妹過世後，我們在清潔睡房期間，找到一隻死老鼠。在戰爭期間，鼠疫是一種致命的疾病。

我們這個大家族的生活，緊密地圍繞著穆斯林信仰。我的祖輩住在今日的北京，從家譜來看，我們這一代已是第11代。我們的祖先在1585年出生，是明末朝廷派遣到廣東的一名軍官，並被指派往廣西平息少數民族的叛亂。他和他的後人平亂有功，在廣東落地生根。在二十世紀初，我的祖父楊贊庭從廣東移居香港，在香港娶了我的祖母沙少卿，並在一所穆斯林的印度公司成為一位出色的廚師。我爸爸從祖父身上學會了印度菜的烹飪技巧，後來亦教曉我媽媽。我的祖父在香港有十個孩子，而爸爸就是最年長的一個。祖父大約在1930年代離世，仍然相當年輕，剛好是爸爸成家立室的時候。祖父的離去，令爸爸楊達卿（又名嘉發）被視為一家之主，不僅是因他年長的緣故，也因他的優秀學歷。

我家的早期生活，以伊斯蘭教的鄰里關係為核心。我家附近的電車廠和總站，當年提供相當多的就業機會，如電車的噴漆及金屬製品，吸引了很多來自廣東的穆斯林移民。這裡近年已發展成為時代廣場，一個成功的商業中心。1918年，中華回教博愛社（The Chinese Muslim Cultural and Fraternal Association）暨清真寺在這區的陳東里成立。戰後數十年，

昔日的設施在原址重建，至今外貌仍一如往昔。中華回教博愛社開辦了一間小學，我在1940年代末曾在這裡唸了一年書。1950年代，在齋戒月中，我家中的男性成員每晚都會到這裡的清真寺祈禱禮拜。這是我們接受信仰本質和原理的時間。穆斯林墳場亦在這兒附近，位於快活谷馬場其他宗教墳場的旁邊。今天愛群道的清真寺是個有名的地方，可以去禱告、飲食及聚會，但它其實在1981年才落成。

齋戒月是禁慾和禁食的時間。在日間，我們家不會吃喝，所有成員會半夜起床，吃一頓豐富的早餐。其中約20多人會跟自己的核心家庭共膳。我們的鄰居最初對此感到十分驚訝，但後來習慣了我們這奇怪的用膳時間。團結和聯繫的時光深深記在我的回憶。家中的婦人會在更早的時間起床和煮食，因為我們要在禁食後才可以再進食（約14小時或以上）。我記得除了患病及其他緊急事故外，我們都不會中斷禁食。哥哥汝谷和我偶爾會在禁食前的進餐後不睡覺，步行到掃桿埔的學校玩球類活動，一直到早上8時上學為止。這培養了我們早期對運動的興趣。後來在中學階段，我們遷至北角的公共屋邨，會用禁食的時間來背誦中國文學經典作品。由於香港中學會考要求閱讀這些中國著名經典，所以那時候會以死記硬背的方式來學習。

那個年代，穆斯林都需要嚴格遵守清真食品的指引。穆斯林餐廳一般開在灣仔區，最為成功和著名的有友蘭、泉香、惠記，最後一間今天仍是一間興旺的大排檔。它們都會供應一些受穆斯林或其他食客歡迎的著名特色小菜。穆斯林的中式

烹調與別不同，需要相當的準備功夫，例如，我媽媽烹調印度菜的技巧就勝過不少餐廳。其他穆斯林開設的中菜餐廳，會提供不同地區的特色菜式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這些餐廳來了又走了，但無論怎樣，它們的位置一般都跟我家有一段距離。對清真食物的堅持，亦可解釋為何我的叔叔要在家中舉行婚宴，因為穆斯林餐廳沒有多大的空間。家是我們活動的中心，我們的親戚及穆斯林朋友都住在我家附近。我媽媽的娘家及親戚就住在鄰近的一個區域。

在戰爭期間，爸爸和四叔回到中國內地找工作，家族和家庭生活都牢牢地繫於祖母和媽媽馬禮華。面對糧食短缺和工作不足，祖母承擔了一切。祖母沒有受過教育，但擁有民間智慧、頭腦清晰、口齒伶俐。她表面上對小孩子嚴厲，但實際上十分關懷後輩，對五叔俊卿（又名嘉德）的關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，五叔追隨爸爸的腳步，成為大通曼哈頓銀行（Chase Manhattan Bank）一位既能幹又有前途的年輕銀行家。後來他在修頓球場擔任一場足球賽的守門員時遇到意外，為怕祖母斥責，隱瞞胸部所受的傷，直到知悉嚴重性時一切都已經太遲了，他臨終的時候，祖母給予了最大的支持、鼓勵和關愛。我對她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和愛，不僅因她在這些年月裡所表現的穆斯林氣度，而是她在晚年的勇氣。在她生命的最後20年裡，由於錯過一次白內障手術（遭叔叔否決）而幾乎失明。她在1996年以104歲的高齡辭世，是我所認識最長壽的人。直到她的晚年，她仍能夠在這麼多家人當中，透過聲音分辨她的兒孫，毫無半點困難，這絕不是簡單的事。

我媽媽同樣只有小學教育程度，但她是一個機靈和聰明的婦人。當爸爸在二戰期間離開香港，她要獨力照顧四個孩子，是一項極大的挑戰。她時常保持樂觀和敏銳的觸覺，而我是個很好的聆聽者。戰後，我跟她的關係份外親密，因為在聘請家務助理前，我協助她看顧年幼的弟妹。她對我所說的鼓勵說話，激勵我在求學上及生命上定立目標。媽媽能夠背誦《孟子》和廣東民謠的旋律，對我及其他孩童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她在1986年於加拿大的卡加利（Calgary）突然辭世，在我心裡留下難以治癒的傷口。

我家附近有各式各樣的小學，但我們選擇了嘉道理爵士小學（Sir Ellis Kadoorie School），一所位於掃桿埔的官立學校，距離我家約有半個小時的步程。可能由於創辦人有猶太人背景，穆斯林學生較易入讀該校，學校並承諾派學生入皇仁書院（Queen's College）接受中學教育。我爸爸和親戚曾走過這個門徑，如今我這一代也是如此。穆斯林華人學生入學時需要採用穆斯林名字。我爸爸的穆斯林名字是 Yusuf Shamsuddin，後面才是姓氏；汝谷的穆斯林名字是 Jacob，而我的是 Rathman。汝谷和我在嘉道理爵士小學期間，一直採用穆斯林名字，直到升讀皇仁書院後，由於穆斯林名字對老師和同學或會有點困難和陌生，所以才改用中文名。大部份其他穆斯林華人學生都會這樣做。

我爸爸在學校是個優異生，每年都考獲獎學金，令他在穆斯林華人家庭中聲名大噪。學術能力上，他的烏都語（Urdu）跟印度學生的水平相等，是一個出色的學生，獲取三年政府